

现代乡土小说 三家论



• 范家进 著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 / 范家进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2.6

(三联文博论丛)

ISBN 7-5426-1697-8

I. 现… II. 范… III. 乡土文学—小说—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0165 号

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

著 者/ 范家进

丛书策划/ 苏 梦

责任编辑/ 陈宁宁

装帧设计/ 范峤青

责任校对/ 张大伟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0235)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sanlianc@online.sh.cn

印 订/ 上海市印刷七厂一分厂

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1240 1/32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10.75

印 数/ 1—3100

ISBN7-5426-1697-8

I·194 定价 20.00 元

目 录

总 序	钱谷融(1)
导 论	(1)
上篇 鲁迅：“忏悔贵族”的乡村遥望	(23)
第一章 “思想革命”视野下的乡土中国	(34)
第二章 民间的迷妄与“狂欢”	(60)
第三章 “双向隔膜”的发现与“双向批判”的开展	(82)
中篇 沈从文：“现代绅士”的乡村挽歌	(109)
第四章 乡村经验与二十年代的北京文坛	(115)
第五章 湘西梦幻的建构与消解	(142)
第六章 “风俗美”的另一面	(173)
下篇 赵树理：“农家子弟”的“乡村启蒙”	(211)
第七章 自下而上的生存选择与文学选择	(218)
第八章 “方向”的制造和“问题小说”的终结	(249)
第九章 疏离“五四”与走向民间	(289)

结 语.....(325)

在都市、乡村与小城之间穿行(代后记).....(332)

主要参考书目(337)

导 论

世纪转型时期的中国，总算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真心关注起了在空间上和心理上都与都市隔得相当遥远的乡村，并且尝试着从新的理论和新的视角出发重构乡土中国的当代图景。学术界有人大张旗鼓地倡导“农民学”^①，有人借助西方现代人类学理论研究和阐释中国普通村落视野里的“文化与权力”^②；文学界中一些有着不同程度乡村经历的实力派作家或是身体力行地“融入野地”^③，或是以试验性文体捕捉普通乡村人的日常用语、试图从中窥探和还原被一个时期的主流话语所遮蔽的

① 秦晖是其代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央编译出版社陆续推出了由他任执行主编、编委中包含不少外籍学者的“农民学”丛书。

② 见王铭铭著《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三联书店，1997年12月第1版。

③ 张承志、张炜是其间的重要代表，后者有散文集《融入野地》行世。

普通人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①，或是不无骄傲也不无苦涩地标举和表现自己与“知青作家”迥然不同的农民出身背景^②；更有人从中国文化的近期发展格局出发预测乡村问题将成为新的“话语言说中心”^③……这些迹象充分显示出中国文化界在跨入新世纪门槛之际的一些崭新生机：在乡村认知与表现上长期处于依附地位的中国知识界正在艰难地挣脱历史的重负，尝试着去努力获取广袤中国大地上丰富多彩而又千差万别的乡村知识或“地方性知识”，从而更真实、更切近地去观察和了解那无所不在地包围着一个又一个城市的中国乡村、那构成“中国人”之绝大多数的中国乡村社会居民。有了这样的起点，或许我们就不无理由相信：经过不同领域知识界的努力，对于那个真正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广大中国乡村，一种崭新的理解、表现和言说方式，将冲破重重阻力执着而顽强地一步步浮出水面。

然而，在尝试融构新知的时候，我们的身后毕竟已经静静躺卧着长长的历史身影。别的领域暂且不说，就以新文学的近百年发展历程而论，乡村、农民、乡土，就一直是它的关注、描写、叙述和想象的中心或重心之一。在新文学创始人鲁迅那里，农民与知识分子一直是他小说创作中两类并驾齐驱的观察和描写对象，他一生中篇幅最长、塑造典型人物最为成功的小说恰恰是献给“未庄”农村及破产农民“阿 Q”的，这也颇具象征和启示意义。在他的文学活动的影响和示范下，现代作家

① 代表作有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② 见贾平凹《我是农民——乡下五年的记忆》，《大家》，1998年第6期。

③ 见焦国标《营造第三个话语中心》，《读书》1998年第12期。

的忧郁目光和沉重心灵几乎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正经历着剧烈的现代变迁，因而更显得多灾多难而又受尽屈辱的中国乡村及居住其间的底层中国百姓。被当今小说史家认为具有文学流派或准流派意义的 20 年代“浙东乡土小说作家群”，30 年代的“社会剖析派小说”、“京派小说”，40 年代产生并在建国以后获得继续发展的“山药蛋派”、“荷花淀派”小说以及主要是在建国后发展起来的所谓“茶子花派”小说^①……等等，宛如一条川流不息的长河，将东西南北各式乡土中国的人物、场景、故事及风俗蜿蜒曲折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从而大大丰富和拓展了 20 世纪的中国小说风景。而这其间的代表作家及其文学思想、小说理念和某些具体表现手法，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鲁迅的影响、刺激和启迪，——自然，这样的影响并非都是对鲁迅这一传统和源头的正面“对接”或全盘接受，而是同时也存在着分歧、错位、冲突以至“反接”，譬如“京派”小说家沈从文对于风格与情调的独特追求、50 年代以来乡土小说作家的知识分子批判立场的整体退隐，就与鲁迅的乡土小说传统走着不同以至相反的※路子。不过换个角度看，这也恰恰使得 20 世纪的中国乡土小说具有了相对丰富的形态和样式。

为什么只能说是相对丰富而多样？因为从更严格的文学标准来看，我们不能不承认，20 世纪的乡土小说正与整体性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一样，其足以彪炳史册的创造性艺术成就并不算太高。如果以独立发现与开掘生活的能力及表现手法上的独创

① 参见严家炎著《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年版）、杨义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本（出版社同前）、刘洪涛著《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年版）、朱晓进著《“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同前社，1995 年版）等。

性来衡量，传统现、当代文学史版图的重大改写与删削就是不可避免的。一些曾经被奉为经典的名家名作，随着历史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我们不难看到作者在各式自身因素与时代因素的制约下所带来的看取与审视乡村生活过程中的种种遮蔽与限制；一些在特殊的年代里曾经大红大紫过的乡土小说作品，经过时间的无情淘洗早已显露出了丑陋的本相，无论在思想还是艺术上对于人们都不再具有吸引力；而另一些发表后随即遭受批判、并被长期打入冷宫的作品，倒反而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显示出独立面对当代中国乡村生活的可贵勇气……短短数十年中，乡土小说作品及其作者的命运都几经沉浮、历尽沧桑，其间的是是非非、臧否抑扬，至今还时时引发文坛上的论战硝烟。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各自又意味着什么？哪些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坎坷与崎岖，哪些又显然出于人为的失误与局限？那些严重地制约着作家想象力与艺术独创力的主观及客观因素究竟是什么？面对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历史变迁因而极度躁动不安的乡村大地，新世纪的中国作家倘若要向世人提供真正无愧于时代和历史的优秀乡土小说巨著，已逝的 20 世纪乡土小说发展历史中又有哪些经验与教训值得吸收和借鉴？……全面而系统地探讨这些问题将不是本书所能胜任的，本书只是将聚焦点对准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描写乡村的三个重要的代表人物——鲁迅、沈从文、赵树理，通过对他们的乡土小说及人生命运旅程的解剖与分析，尝试清理和剥离出 20 世纪以来现代中国作家面对乡土中国所产生的三种基本思想姿态、情感姿态和艺术姿态，从各个层面探讨制约着这些姿态及乡土小说艺术创造成就的诸多文学因素与非文学因素；并希望借此窥一斑而察全豹，通过对这三个个案的分析获得对 20 世

纪我国乡村认知与言说历史的某种程度上的整体性把握，以便为新世纪的乡村认知（当然不局限于文学化的认知）寻找一种较为坚实的历史依托和借鉴。

二

在文学研究与批评的方法日趋多元而驳杂的今天，要找到一种既能贴切地描述自己的研究对象又能与批评家自身的内在生命体验相吻合的批评方法确非易事。即使是对 20 世纪中国作家的乡土小说创作，可以选择的观察视角和阐释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传统的社会学或“泛政治学”的批评并未完全失效，因为自中国进入近代史阶段以来，无论是主要居住在城市作家还是广大的乡村社会及其居民，他们所经历的社会动荡与政治变迁都是前所未有的，倘若想撇开这些社会和政治因素，乡土文学作品几乎就只能剩下一具空壳。借着上世纪 80 年代“文化热”的东风，加上中国社会地域的广阔和作家笔下人物与场景之地域色彩的鲜明，“区域文化”视角也被许多研究者所乐于采用，并汇聚成了一套重在阐释地域文化与乡土题材作家之关系的研究丛书^①。而心理学知识无论在分析作家还是其笔下乡村人物的心理结构和特征方面都是有效的。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面对我所选择的这三位作家，我将以怎样的路径迫近他们，又以怎样的方式阐述他们关于乡土中国的创作及其意义呢？在系统交代本书所采用的分析视角之前，也许有必要从较为传统的作家“为什么写”的角度或称“作品动力学、创作发

① 即由严家炎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陆续推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

生学”的层面，来看看这三位作家在乡土小说创作起因上的明显差异，以此让我们获得关于这三位风格与手法都迥然不同的作家的初步印象。

鲁迅作为深受晚清一代文化启蒙大师直接浸润与影响的“五四”一代启蒙主义者的杰出代表，他投向乡村的目光与情怀带着极为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他是满怀对传统中国社会与文化彻底再造的整体性伟大理想来弃医从文、投身新文学倡导与实践运动的，正是这种再造中国的伟大理想的熊熊燃烧驱使他将对忧郁而悲伤的目光投向多灾多难的古老乡村大地，投向在这片神奇大地上世代传衍、挣扎求生的“古国的子民们”，尤其是投向他们在不断恶化的现代性生存境遇中精神和心理世界的日趋硬化与蜕变，——由此，鲁迅将揭示民族精神病态和改造国民性的工作坚持到了他目光所及的一切领域，对于大众启蒙的自觉承担以及由此出发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模式的彻底反叛成了他从事乡村题材创作的最为坚强有力的立足点。因此，即使到了 30 年代，鲁迅仍这样回顾和叙述他文学活动的动机和目的：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①

他还继续表达着他对我国传统文艺投向乡村视角的强烈不

① 鲁迅《我为什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以下版本同此）第 4 卷，第 512 页。

满：

中国的诗歌中，有时也说些下层社会的苦痛。但绘画和小说却相反，大抵将他们写得十分幸福，说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平和得像花鸟一样。是的，中国的劳苦大众，从知识阶级看来，是和花鸟为一类的。^①

这种从“花鸟”视角向“疗救”视角的转变，从将表现对象看作“不识不知”的“物”，转向感同身受地将他们看作与普通人一样有着自己喜怒哀乐的“人”，正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实质性标志，是中国现代作家努力挣脱传统的强大束缚转而追求文学的现代性特征的革命性举措。可见鲁迅之所以将自己的视线与笔墨投向乡村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理性认识与自觉的文学现代性的追求，鲁迅由此被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奠基人也正是当之无愧的。

沈从文和赵树理的情形则与此均有不同。有人曾将“五四”一代称作“开放心灵”的一代，而将1925年后至抗战前的一代称为“在具体专业领域内创造模式的一代”^②，这确是在某种程度上说出了两代人之间的本质性差异。当然，倘若从思想史及文艺观念的结构性转换角度看，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一代文化精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造规范的一代，划定并制约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感受与思维定式的一代。比较而

① 鲁迅《集外集拾遗·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7卷，第389页。

② 李泽厚《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见其《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217页。

言，在“五四”退潮后进京学艺的沈从文和在 30 年代才正式开始文艺习作的赵树理，都已不再具有创立规范的气魄和功力，而首先面临的是如何面对“五四”一代初步奠定的新文艺规范、如何确立自己对这种渐成主潮的文学观念及相应的表达方式的或认同效仿或疏离抵拒的态度。与鲁迅更为重要的区别也许还在于各自从事文学创作时的社会地位及其在都市所处的具体生活方式、生存状态。无论是 20 年代在北京“窄而霉”小斋里发愤卖稿的沈从文还是 30 年代在省城太原辗转求生的赵树理，他们在从事文艺习作之初与其说是受着崭新社会文化理想的温情召唤还不如说是直接受着现实生存境遇的无情驱使、鞭打和逼迫，他们从最初的苦苦练习与追求，到渐渐发现自己的才能，直到慢慢地在一定的文化圈内被认可和接纳，一直到成为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自己特色与影响的作家，其间经历了相当漫长而曲折的历程。因此，倘若说在从事文艺活动之初，鲁迅一开始就抱有明确而坚定的社会文化信念，而沈从文、赵树理则更多地是为了“稻粱谋”、为了卖文以济生存之苦与穷，因而带有更多的世俗功利色彩，应该是符合他们的实际情形的。

自然，随着习艺过程的展开和自身生存处境的改善，他们在写作动机、文学观念及表达方式上都会发生相应的调整和变迁。在沈从文那里，在最初几年的练笔或毫无节制的“粗制滥造”当中，一些在浓郁的思乡之情驱使下写作出来的文字也夹杂其间，它们以清新质朴的文笔为都市读者提供了遥远偏僻内地山村的未经雕琢的自然山水、与都市社会迥然相异的日常生活场景与民风民俗以及一些面貌、风情、性格与行为方式都让人颇感诧异的边地人物。这些文字一方面有效地抚慰了一个困居北国都市的漂泊青年的孤寂落寞情怀，给“窄而霉”小斋增

添了一丝温馨、装饰了一层梦幻，另一方面因为其中的个别篇章得到了当时绅士派文学群体代表人物徐志摩的不无夸张的推崇和赞赏^①，无形中给正在焦急地寻找着自己文学个性发展方向的沈从文以强烈的刺激和暗示，让他初步领会到都市文学界及相应的读者群真正希望从他的作品里看到的究竟是什么。因此到了 30 年代，尽管沈从文还忍不住不时地要将揶揄嘲弄的目光投向都市的大学生、大学教授及普通市民，但大体上还是能够较自觉地将自己的主要笔墨和才能限定在他最为擅长的对于边地人情风俗和自然山水的温情展示上，并由此为 20 世纪的小说史贡献出了他最为成功的代表作《边城》。在私人通信里，他就不止一次地表达过对自己几乎是独自一人拥有关于河街水手及边地生活知识的巨大喜悦，相当自豪地认为“一个中国人对他们发生特别兴味，我以为我可以算第一位！……我多爱他们，“五四”以来用他们作对象我还是唯一的一人”^②！不妨这么说，这种独自发现和拥有一类独特题材、一片独特表现领域的喜悦和自豪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支配着沈从文创作生涯的内在心态。

从作家与乡村之间的关系角度而言，赵树理比鲁迅与沈从文都要来得更为密切。无论是鲁迅还是沈从文，他们家庭所

① 见徐志摩附在沈从文散文速写《市集》后的《志摩的欣赏》，沈氏读到以后曾致信表示自己的不安，徐氏将这封信发表后又附言再次表示赏识。《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以下版本同此）第 10 卷，第 13 页。

② 沈从文 1934 年 1 月 14 日致张兆和信，见《湘行书简》，凌宇编《沈从文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 年 7 月版）上编，第 226 页。

属的社会身份和经济地位都是“破落贵族”，都是地方社会的大户人家，不过一个坐落在近代以来得风气之先的浙江近海小城，一个位于远离海岸也远离省城而又苗汉杂处的湘西内陆山区小镇，一个是世代相传的诗书礼仪之家，一个是祖上在与太平天国作战中立有突出战功的官宦人家，——但两人都有一定的乡村血统，鲁迅的母亲来自于乡村大户人家，沈从文的祖母则是生下儿子后即按当地习俗被远卖他乡的苗族妇人。而赵树理才是来自太行山麓的道道地地的乡下人，远祖中虽然也有过发迹的，但从他往上数，已好几辈子人中找不到一个正儿八经的读书人了^①。因此，乡村的生活方式、乡村社会的价值理念和民间信仰方式以及乡村的艺术欣赏习惯等等，从一开始就血肉交融地与赵树理生长在一起，甚至完全可以说，离开了乡村社会的这一切，赵树理就将不再成其为赵树理。然而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新文学从总体上说都是一种以都市为中心且以都市为出发点的价值体系和文学体系，带着丰富而沉重的“乡土牵累”的赵树理要想很快地认同与接纳它们、并生产出能够被对方所认同和接纳的新文学作品，都是一件极为艰难的事。所以，赵树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没有将文学当作自己安身立命的职业和依托，他清晰地感受到，那是一道很高很高的门槛，不是一个像他那样的地地道道的乡下人所能轻易跨越的。这与在20多岁时就果决地“弃医从文”或立志以文学“征服城市”的鲁迅和沈从文形成了极大的区别。本来，在一个从传统习俗相当浓厚的乡村到正在经历初步现代化冲击的城市寻找个人出路的

① 但据有关传记记载，赵氏高祖一代曾在“乾隆盛世”取得过一定功名。见戴光中著《赵树理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真正的乡下人那里，不一定非要以文学作为安身立命之地不可，文学对其来说也未必具有终极性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赵树理一直游走于城乡之间，以漂泊与求生作为自己的主要生存特征。自从 11 岁入本村私塾旋即辍学以后，在长达 20 多年的时间里，他就一直处在求学与辍学、谋职与解职的恶性循环之中，在城市与乡村从事过无数仅为糊口的“职业”：从小学教员、省立师范学校的官费学生、造反青年、乡村师范学校教师，到江湖郎中、店铺伙计、军阀部队的勤务员、短期的电影配角演员……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直到 1937 年全民抗敌运动兴起和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30 多岁的赵树理才加入以抗战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并在从事实际抗敌运动的武装组织中找到了自己稍具长期性的工作位置。尽管他也曾短期出任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一个地方县份的区长，但他的主要工作是从事抗敌宣传活动。因为他有着对农民发自内心的挚爱、对乡村生活方式、农民语言及各种民间文艺形式的几乎是本能般的稔熟，使得他在这一领域如鱼得水、大显身手，其才华与能力很快被抗日根据地党组织的高级领导人所发现与赏识，经过一定的工作机会的调整和思想上的引导，赵树理终于写出了轰动抗日根据地的代表作《小二黑结婚》与《李有才板话》；此后不久便得到根据地“华北新华书店”编辑的闲差，得以集中精力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因此，20 世纪 60 年代初他在一次回答读者的提问时曾十分坦率地如此介绍过自己的创作源起：

有些同志问我是怎样做起小说来的？其实，我原先并不是干这一行的。在旧社会，我做过小学教员，同时又是

农民家庭出身，干过农活，对于种地的活路也还熟悉。那时家境不好，常常受高利贷的盘剥，因此我跟贫苦农民感情上有些沟通，在他们中间有些根子；参加革命后，虽作过几度报刊编辑工作，在这种岗位上，有些时候就需要写点什么零星文章；自从写了《小二黑结婚》后，领导上说，你会写，就写吧！以后我就脱离别的工作干起这一行来了。^①

语气中虽然略带自我调侃的成分，但他的创作动因带有显著的“外发性”，他对农民的文学关注及其具体表达方式总体上服务于他的功利性政治目的，则是毋庸置疑的。

三

最初与文学结缘方式的不同，对乡村社会关注起因的不同，以及对这份关注的意义归趋与理解方式上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这三位作家笔下乡村图景与面貌的歧异，影响着他们对于现代境遇里中国乡村人生存状态与命运沉浮的感受和理解方式，支配着他们对于乡村主人公心理、性格、精神及价值观念的理解、想象方式和审美观照方式，——简言之，极大地影响着他们面对中国乡村的基本姿态。自然，文学创作又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精神创造活动，“为什么写”并不最终决定着具体“怎么写”，动机与意图仅仅是其中的一种制约因素，在进入实际的创作过程以后，种种必然的或偶然的，创作界的或读者公众的，个人生活变迁的或外在社会政治变动的，一个时

^① 赵树理《做生活的主人》，《赵树理文集》第四卷，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5页。

期社会风气的或知识界精神走向的……等等诸方面原因，都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来规约和影响一部作品的内在结构及一个作家创作道路的动态演变轨迹。就一部部具体乡土作品的内在吸引力或一个个具体作家的成败得失而言，关于“怎么写”的诸多因素的制约就远比“创作动机”要来得更为关键而吃紧。

那么，我们将怎样来考察这三位作家在“怎么写”问题上的差异呢？上述关于作家“为什么写”的基本印象，已有许多研究成果对这三位作家所取得成就的充分肯定与阐释，再加上世纪转型时期知识境遇的巨大变迁，都在以不同方式制约着我们对于这三位作家的观察视角与分析路向。具体地说，本书将把主要注意力较多地放在这三位现代作家关于乡村的文化、社会与政治姿态的形成上，更多地关注与正视他们在创造乡土小说时所遭遇的各式困境与紧张，毫不回避他们在个人经验、时代知识氛围及社会动荡变迁诸多因素限制下所导致的关于乡村人与乡村社会的各式盲区和遮蔽，总而言之，解剖他们及其作品当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将远远多于分析与阐释他们的成就（因为已有很多研究者从事过并正在从事着这后一方面的工作），对于其间严重制约着诗意之产生与创造的各式“问题”（尤其是乡土中国问题）的兴趣将远远大于对“诗意”本身的关心与鉴赏，因此已经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不过在目前的知识、社会与文化语境下，我倒并不后悔作出这样的选择。为此，本书在对三位作家的乡土小说创作进行考察与分析时，主要的关注点将设定在以下几个层面——

其一，作家是以怎样的方式来获取和拥有其乡村经验的？自中国被动性地进入近现代进程以来，其间乡村社会所经历的动荡与变迁虽然是总体性的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组成部分，但